

梁啓超家庭講學考述

夏曉虹
· 抽印本 ·

梁啓超家庭講學考述

夏曉虹
· 抽印本 ·

梁啟超家庭講學考述

夏曉虹^{*}

摘 要

本文根據新發現的梁啟超資料，著力鉤稽梁氏兩次為子女集中講學的情況。除考述所講內容，更將其置於梁本人的學思脈絡中，探求其深層意涵。梁啟超 1909 至 1910 年日本時期的授課以辭章之學為主，意在培植女兒梁思順的國學根基，用以守護自國文化，抵抗外在強大的日語環境。1918 年夏季的講授內容則可分為「學術流別」與《孟子》兩部分。前者留下了〈前清一代學術備忘錄〉手稿，實為 1920 年代梁啟超寫作《清代學術概論》與《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先期預備；後者存有〈讀《孟子》記〉，其論述亦與 1920-1921 年梁啟超在清華學校演講「國學小史」相涉。由此可知，梁氏的家庭講學受益者不僅是兒曹，更擴展而沾溉學界。

關鍵字：梁啟超、家庭講學、辭章之學、清代學術、《孟子》

^{*} 中國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一門三院士，子女俱成才，已經成為廣為人知的梁啟超（1873-1929）家庭教育美談。包括梁氏後人吳荔明所寫的《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在內的多種著作，¹對此早有記述和討論。只是，作為支柱性的史料，作者多半依賴的是梁啟超寫給子女們的家書。²因而，對於其他材料中所透露的梁啟超家庭講學情況，較少受到關注。應該承認，此前由於資料的相對匱乏，這一研究確實很難展開。目前隨著梁啟勳的一批收藏面世，特別是其中一份梁啟超講學備忘錄的發現，使相關議題有了推進的可能性。不僅梁氏私學講授的內容可以得到更具體的展示，對於理解其 1920 年代的學術走向也提供了清晰的路標。

一、雙濤園：以辭章之學為主

梁啟超子女眾多，除去幼年夭折者，尚有兄弟姐妹九人。長女梁思順（字令嫻）1893 年出生於廣東新會，虛齡六歲時，即遭遇戊戌政變，父親流亡日本。大致在 1900 年，思順跟隨母親來到父親身邊，³所受教育因此基本是在日本完成。長子梁思成則比思順小八歲，也即是說，1901 年以後，梁啟超又陸續誕育了八個孩子。

雖然關於梁思順在日本女校讀書的情況尚不清楚，但曾經入讀由維新派主持的橫濱大同學校則無疑問。⁴而據 1905 年 10 月 14 日梁啟超寫與二弟啟勳的信：「思順今年功課頗進，但不能來歐美，則明年須入東京，苦無佳校耳。」可見其應該一直跟隨父親居住。並且，起碼在 1909 年 10 月 21 日給梁啟勳的書笥中，梁啟超已提及：「頃每日與順兒講文，亦致有興味也。」⁵如與梁思順日後的自述「余十七歲始獲受業於余父耳」對照，⁶可知其

¹ 吳荔明著《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初稿連載於 1991 年《民國春秋》第 1-2 期，後擴寫成書，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推出，臺灣立緒文化公司（2001）、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亦先後重版。張朋園之〈梁啟超的家庭生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歷史人物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對此問題也有討論。

² 以這批書劄手稿為主體編成的《梁啟超未刊書信手跡》，由中華書局 1994 年出版。後出現過據此整理而成的《梁啟超家書》多種。

³ 梁啟超 1910 年 4 月 7 日作《嫻兒生日》詩，中云：「間關侍母來，省我蛟鼉窟。……邇來又十年，景光駛以疾。」（《雙濤閣日記》宣統二年二月二十八日，《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九，上海：中華書局，1936，頁 38）以此推知梁思順來日時間應在 1900 年，且目前所見梁啟超與夫人李蕙仙書，亦止於 1900 年 6 月 30 日（見張品興編《梁啟超家書》，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

⁴ 須藤瑞代曾調查梁思順在日本讀書的學校，但未能確定（見須藤瑞代著，須藤瑞代、姚毅譯《中國「女權」概念的變遷——清末民初的人權和社會性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 175-176）。而梁啟超 1912 年 12 月 16 日與梁思順書中有言：「從前在大同學校以功課多致病，吾至今猶以為戚，萬不容再蹈覆轍。」（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梁啟超未刊書信手跡》，北京：中華書局，1994，上冊，頁 111）

⁵ 梁啟超：〈致梁啟勳書〉（光緒三十一年九月十六日、宣統元年九月初八日），中華書局編輯部、北京匡時國際拍賣有限公司編：《南長街 54 號梁氏檔案》（北京：中華書局，2012），上冊，頁 13、33。

⁶ 梁令嫻：〈敬述吾家舊德為婦女雜誌祝〉，《婦女雜誌》第 1 卷第 1 號（1915），頁 8。

確實自此時開始接受梁啟超特設的家庭教育。

由於子女間年齡的差距，其時梁啟超施教的對象主要應為思順。而令其更多負起教育長女責任的原因，又可能與住址的改變有關。自 1906 年 12 月後，梁啟超移居距離神戶八十里外之須磨村怡和別莊。⁷在這個隨後被命名為「雙濤園」的寓所裏，梁氏一直住到 1912 年 9 月底歸國。而在梁啟超之前，萬木草堂同學麥孟華曾於 1908 年寄居梁家數月，思順隨其讀書。麥氏「授以中外史乘掌故之概，暇則從問文學源流正變」，並幫思順擇定了《藝蘅館詞選》篇目。⁸因此，梁啟超隨後的「講文」，其實可視為接手麥孟華已經發軔的工作。

不過，當日梁啟超對長女的教育，主要還是集中在傳統所謂「辭章之學」，即梁所言「稍從鉛槧餘，示汝學津筏。頗復雕文心，漸亦解詩律」。⁹1909 年 11 月 5 日，梁啟超函告二弟，「方並力以著射利之書（中學國文教科也），無意中反使嫻兒獲大益」。¹⁰儘管此《中學國文教科書》的具體內容目前無法知曉，但其作為國文課教材，先已施諸家庭，並讓最早的使用者梁思順獲益匪淺。

而倘若細讀寫於 1910 年（庚戌）陰曆元、二月份的《雙濤閣日記》，可以更為翔實地鉤稽出梁啟超的家教日程。此時，梁思順每日的功課有寫日記一項，所以，梁啟超筆下屢屢出現「為嫻兒（輩）批點日記」的記述。歲末作〈題藝蘅館日記第一編〉，梁氏亦自道其良苦用心：

日記筆庚戌，藉用知所無。卒歲得千紙，占畢亦云劬。吾唯愛汝深，責難與凡殊。文章所固有，相期在道腴。簡編我手答，戢戢蠅頭書。發蒙通德藝，陳義雜精粗。當學豈只此，為汝舉一隅。

原來寫日記兼有學文、進德、發議論多項功能，故適宜用作綜合訓練。而每日的堅持不懈，又可以踐履「古人於為學，終身與之俱」、「程功固要終，辨志良在初」¹¹的求學之道，難怪梁啟超如此用心逐日批答。

家庭課業的第二項內容為命題作文。此乃依照傳統的學文方式，又加入梁啟超對史學的特殊興趣，故 1909 至 1910 年間，在梁啟超的安排下，思順用了半年多時間，「補讀《左氏傳》、《後漢書》」，「笥記日數條，課卷旬一帙」。這也是梁啟超為之撰寫〈藝蘅館文卷第

⁷ 參見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 368-369、376。

⁸ 梁令嫻：〈《藝蘅館詞選》自序〉，氏編《藝蘅館詞選》（1908）。

⁹ 梁啟超：《雙濤閣日記》宣統二年二月二十八日（1910 年 4 月 7 日），《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九（上海：中華書局，1936），頁 38。

¹⁰ 梁啟超：〈與仲弟書〉（宣統元年九月二十三日），同註 7，頁 492。

¹¹ 滄江：〈題藝蘅館日記第一編〉，《國風報》第 2 年第 11 期（1911），頁 121。

一集敘〉的由來。¹²日後，梁啟超為清華學校學生編著《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在〈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中，依然列入了《左傳》與《後漢書》，且教導學生，讀史的同時，亦可兼顧「學文」：「《左傳》宜選出若干篇熟讀成誦，於學文甚有益。」包括《後漢書》在內的「四史」，「其書皆大史學家一手著述，體例精嚴。且時代近古，向來學人誦習者眾，在學界之勢力與六經諸子埒。吾輩為常識計，非一讀不可。吾希望學者將此四史之列傳，全體瀏覽一過。仍摘出若干篇稍為熟誦，以資學文之助。因四史中佳文最多也。」¹³凡此等經驗之談，當然也是涵括了自家教讀的體會。

而梁啟超不只是出題目，作為一位慈愛的父親與嚴格的教師，在「嫻兒讀史，欲為笥記，而苦無津逮」之時，亦立即以身作則，親自示範。1910年2月24、25兩日的《雙濤閣日記》中，即保留了梁啟超「為嫻兒程式」寫下的兩則範文，分別題為〈讀《後漢書·樊宏陰識傳》〉與〈讀《後漢書·劉趙淳於江劉周趙傳》〉。前篇傳主雖為二人，梁氏的著眼點卻只落在樊宏一脈，篇中多夾以世界眼光與現代意識。如首節：

樊重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凡欲成大業者，必不可有見小欲速之心。蓋人類所以異於禽獸，文明人所以異於野蠻者，以其能知有將來而已。所見將來愈遠，則其成就也亦愈大。治生、經世，其道一也。德國人最號遲重，每舉一事，常責效於百數十年以後。今世各國，所行義務教育之制，國民皆兵之制，皆德人創之於十九世紀之初，而舉世共嗤以為迂者也。及十九世紀末，則向之笑者，咸相師矣。豫章之木，生七年而後可識。其所以自為榮養者，固非朝菌之所得而喻也。

這已是在學文中融入新知識。後篇範文則更近乎舊時習見作法，錄全文如下：

此孝義傳也。後史率別標「孝義」之名，范書則否，此正以見孝之大也。孝為庸德，孝而別標傳，則忠也、廉也皆宜別標傳矣。傳中諸賢，其從政蒞民，皆卓卓有可表見，所謂「錫類不匱」也，豈徒獨善其身而已！夫能獨善，則未有不能兼善者；不能兼善，斯所謂「獨善」者，亦有未可信矣。

蔚宗論毛義、薛包二子，誦其推至誠以為行，行信於心，而感於人，可謂知本。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此其效，

¹² 梁啟超：《雙濤閣日記》宣統二年二月二十八日（1910年4月7日）、正月五日（2月14日），同註9，頁38、3。日記有云：「嫻兒今日生日，作一詩示之。」中有「行此六閱月」、「將卒業」之句。

¹³ 梁啟超：《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清華週刊》第281期之《書報介紹附刊》第3期（1923），頁7、9。

豈僅在一身一家哉！

劉平與賊期約，猶不肯欺，所謂「以身殉義」，非矯飾所能為也。其以身代孫萌受刃，此資父事君之明驗。苟有血氣，皆將感動。賊之起敬，非偶然也。淳於恭見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凡重名節者，亦必重人之名節，斯乃真「錫類」之義也。先高祖穀軒公，平生行誼，類此者甚多。蓋一由施恩於人，不願人知；一由諱人之短，不欲人愧。非安仁之仁者，不能如是也。吾行將述一家傳，備輶軒之采，以厲末俗焉。¹⁴

而以父親之作為藍本，梁思順起碼寫過〈隗囂竇建德合論〉、〈讀《曲逆侯傳》劄記〉。梁啟超為批改前文，「竟至徹夜」；讀過後文，則吟成七律一首。¹⁵倘若依照《古文辭類纂》的分類，除可歸入「序跋類」的史論外，由其指定的題目尚有應列入「奏議類」的〈請復宋儒王安石從祀孔廟摺〉，¹⁶由此可見梁啟超對女兒的文體訓練相當全面，並不存在性別歧視。

上述兩項主業之外，梁思順也學詩、學書，且相當刻苦，一如梁啟超詩中所描述：「嚮拓顏歐書，昔昔劬不聿。有時曼聲吟，啾唧若秋蟀。」¹⁷詩詞的嗜好在梁思順是早已有之，故十六歲即有《藝衡館詞選》之編。而或許是為了練習書法的需要，梁啟超在 1910 年曾為之講授〈《說文解字》敘〉。¹⁸後者其實也可以導向更專深的學問，只是對於當時的思順還言之過早。

實際上，須磨時期梁思順以辭章為主的學習，在梁啟超那裏原本存著深刻的用心，即是為了培植女兒的國學根基。恰如思順自陳：「生小寄他邦，故國勞延佇。」¹⁹在一個外在的、強大的日語環境中，故國的文化傳統需要經由父輩的精心傳授，才能夠抵抗外力，在其心中生根。而這份對於自國文化即「國學」的守護之情，在梁啟超為女兒十八歲生日所作的詩篇中也有充分的表達：

汝已解作文，幸不病癡詰。行當渡西海，通郵掇華實。國學苟多荒，雖美終有

¹⁴ 梁啟超：《雙濤閣日記》宣統二年正月十五、十六日（1910年2月24、25日），同註9，頁11-13。

¹⁵ 參見梁啟超：《雙濤閣日記》宣統二年正月二十日（1910年3月1日），同註9，頁18；〈觀嫺兒《讀〈曲逆侯傳〉劄記》有所感漫題其後〉，《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上海：中華書局，1936），頁56-57。

¹⁶ 梁啟超：《雙濤閣日記》宣統二年二月十日（1910年3月20日），同註9，頁25。

¹⁷ 梁啟超：《雙濤閣日記》宣統二年二月二十八日（1910年4月7日），同註9，頁38。

¹⁸ 梁啟超：《雙濤閣日記》宣統二年正月十二日（1910年2月21日），同註9，頁9。

¹⁹ 梁思順：〈集霧峰莊林氏菜園，分韻得「舉」字〉，許俊雅編注：《梁啟超與林獻堂往來書劄》（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7），書信編校，頁115。

闕。勉矣鋏不舍，希聖究始卒。葆此雛鳳聲，毋為江北橘。²⁰

儘管樂於見到女兒博通西學、馳騁世界，但中國文化仍被梁啟超視為落腳點，故切囑思順即便身居日本，仍不得化橘為枳，而要持之以恆地研習國學。顯而易見，這樣的家庭教育已超越了單純的知識培訓，而帶有更深廣的文化意涵。

二、飲冰室一：1918 年為群兒講學綜考

1912 年 10 月梁啟超回國時，梁思順因正在學習經濟學，故暫留日本。至次年 5 月其畢業歸來，²¹梁啟超卻又忙於從政，先後出任司法總長、幣制局總裁，參加反對袁氏稱帝的護國戰爭與反對張勳擁清帝復辟的討逆之役，直到 1917 年 11 月方辭去財政總長，從此不再染指政務。重新恢復了著述生活的梁啟超，比之前期的更多政治宣傳，此後已轉為以學術研究為主業。

1918 年上半年，梁啟超投入不少精力，撰寫《中國通史》。寫作間隙，也開始為子女講學。關於此事，《梁啟超年譜長編》有如下記述：

夏秋間，先生從事著述以外，曾為長女令嫻等講國學源流甚久，……²²

以下接連引用了梁啟超寫給啟勳的三封信以及一通致陳叔通書，只是信函均未署日期，故有必要稍作考證。

利用梁啟勳藏笥原件，可知此三信均署了日子而未記月份。其中編次在第二封的「十八日」所寫信笥有如下數句：

吾廿一日本擬來，因含沙射影且多，只得在家致心敬而已。一月來為兒曹講「學術流別」，思順所記講義已裒然成巨帙（《史稿》僅續成八十餘葉耳），惜能領解者少耳。²³

²⁰ 梁啟超：《雙濤閣日記》宣統二年二月二十八日（1910 年 4 月 7 日），同註 9，頁 38-39。

²¹ 梁思順〈致林獻堂函〉四（1912 年 11 月 7 日）：「家大人歸國，本應闔家同行，惟因嫻適聘彼都博學之士數人受理生計學，明秋方可畢業，是以家慈留東相伴，待畢業後始歸也。」（同註 19，頁 161）其歸來時間，據梁啟超 1913 年 4 月 23 日〈示嫻兒書〉，「五月廿一日，吾必在津俟若曹也」（《梁啟超未刊書信手跡》，上冊，頁 259），可知梁思順應於當年 5 月 21 日後回到天津。

²² 同註 7，頁 864。

²³ 梁啟超：〈致梁啟勳書〉（1918 年 7 月 18 日），同註 5，頁 108。按：信函日期乃由筆者考訂，與書中

信中所言「廿一日」事，參照此次新出現之梁啟超「十四日」函：「廿一日為循若（按：戴戡字）周忌祭，是日所費可由我擔任。」²⁴查《晨鐘報》1918年7月12至20日第一版所登《周年追悼會啟事》，中言「爰定於二十一日午後二時，假江西會館開會追悼，以志哀思」。²⁵由此可知，上述二信均應寫於7月間。

另一致陳叔通函，查上海圖書館所藏任心白手抄、張元濟手校之《飲冰室尺牘》抄本，亦可見落款為「十八日」，其中關於家庭講學的內容作：「《史稿》亦賡續無間，惟每日所成較少，一因炎熱稍疲，一因上半日為兒曹講學，操觚之晷刻益少也。（講題為『國學流別』，小女錄講義已彪然成巨帙，為新學小生粗知崖略殆甚有益，惜不堪問世耳。）」²⁶此笱所用字句，與7月18日梁與其弟書相近，故可斷為同日所寫。由此上推一個月，則其講學活動至少從6月中旬已經開始。

而其結束則與梁啟超生病有關。《梁啟超年譜長編》記云，「八九月間，先生因著述過勤，曾患嘔血病甚久」。所引梁「當日致陳叔通、張菊生一書裏自述其事」：

昨得叔兄與仲策書，今得菊兄書，知以賤恙勞焦念極矣。病初起本不輕，西醫言是肋膜炎，且微帶肺炎。蓋蓄病已旬日，而不自知，每日仍為長時間之講演，餘晷即搦筯著述，頗覺憊而不肯休息。蓋發熱殆經旬矣，後忽喀〔咯〕鮮血約半盃許，始倉皇求醫。服東醫藥旬日，病不增而已，而憔悴日甚。老友唐天如自粵急難來相視，服其藥五日，病已去八九。賤軀素頑健，必可無慮，再數日當全平復矣。病中飲食如恒（胃始終健），讀書亦不少。知念謹聞。

查抄本，此信署「十一日」。²⁷檢視《張元濟日記》，1918年9月6日「發信」欄有「任公」²⁸之名，因知梁氏回書的日期即在本月。由9月11日上推十五天（服日醫藥旬日與服唐天如藥五日），則梁之停止講學大致在8月27日前後。

綜上可知，自6月中旬到8月下旬，梁啟超的家庭講學持續了兩個多月，並且，這已成為每日上午例行的功課。故可想見，其所授內容必定相當豐富。不過，根據書信，目前能夠知道的細節尚只有清代學術與《孟子》兩部分。

按照《梁啟超年譜長編》各信排列的次序，很容易得到梁氏先講《孟子》、後講清學的印象。實際情況應該正好相反。現存一封寫於「來復六夕」的與梁啟勳函（《梁啟超年

所記不盡相同，此劉原署「一九一八年」。又見《梁啟超年譜長編》，頁864。

²⁴ 梁啟超：〈致梁啟勳書〉（1918年7月14日），同註5，頁161。原誤署「約一九二一年」。

²⁵ 梁啟超、熊希齡等：〈周年追悼會啟事〉，《晨鐘報》第1版，1918年7月12日。

²⁶ 梁啟超：〈致陳叔通君〉，《飲冰室尺牘》，任心白手抄、張元濟手校抄本；《梁啟超年譜長編》，頁865。

²⁷ 同註7，頁865-866；梁啟超：〈致菊公、陳叔通君〉，《飲冰室尺牘》。

²⁸ 張元濟：《張元濟日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下冊，頁440。

譜長編》排在 7 月 18 日信後)，有關講學的部分如下：

吾為群童講演，已月餘，頗有對牛彈琴之感。尚餘一來復，「學術源流」（吾所講卻與南海有不同）卒業矣。來復二將講「前清一代學術」，弟盍來一聽，當有趣味也。²⁹

據此，「前清一代學術」仍是包括在餘下一周的「學術源流」講授之中。另有「二日」所書一笥（《梁啟超年譜長編》排在 7 月 18 日信前）：

為群兒講「學術流別」，三日後當了。更擬為講《孟子》，（非隨文解釋，講義略同學案也。）彼輩如何能解，不過予以一模糊之印象，數年以後，或緣心理再顯之作用，稍有會耳。吾每日既分一半光陰與彼輩，亦致可惜，弟能來聽極善。但講《孟子》亦總須兩旬乃了，弟安能久住耶？³⁰

其中明言，「學術流別」講完後，方進入《孟子》的授課。而此「二日」，既可以排除停講後的 9 月 2 日，又不可能為開講之初的 7 月 2 日，唯一的可能就是 8 月 2 日了。如此，講《孟子》大致系從 8 月 6 日開始。

釐清了 1918 年夏梁啟超家庭講學的起止時間與先後序列，下文便將依次考察其所授內容與後續效應。

三、飲冰室二：清代學術研究的再出發

1918 年底，梁啟超出遊歐洲一年餘。清代學術即成為其 1920 年歸來後的一個研究重點，為此先後出版過《清代學術概論》與《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兩部專著。而這一研究工作的醞釀與準備，可落實在 1918 年。不過，關於梁啟超在家中講授「前清一代學術」，以前沒有其他線索，無從知曉其具體內容。近日梁啟勳收藏的「南長街 54 號梁氏檔案」面世，其中一份命名為「清代學術講稿」的文件，恰可彌補若干缺憾。

此稿今存二十二頁，以朱線八行箋書寫，所用紙張與上引三封 1918 年梁啟超寫與其

²⁹ 梁啟超：〈致梁啟勳書〉（1918 年 7 月 27 日？），同註 5，頁 79。原署「一九一八年七八月間」。又見《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865。

³⁰ 梁啟超：〈致梁啟勳書〉（1918 年 8 月 2 日），同註 5，頁 112-113。原署「一九一八年」。又見《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864。

弟的信完全相同，並已由梁啟勳裝裱成冊。同一冊中，尚有四頁六行箋紙寫記的有關魏晉南北朝文學、唐詩、元明清戲曲小說的資料，紙色顯分兩種。另多出一張綠色邊框的「飲冰室用箋」，屬便條類，為《稼軒詞》的數字統計。按照梁啟勳 1929 年 12 月 18 日所寫題跋可知其來歷：

此冊共二十七紙。前廿六篇乃七年戊午之夏，伯兄在天津家居，與兒曹講學之備忘錄。由今觀之，實《清代學術概論》之胚胎矣。紙上塗鴉，乃當日兒曹之手筆。最後一紙，則為十七年戊辰初秋著《稼軒年譜》時，計算詞集總數之稿紙。彊村本之《稼軒詞補遺》中有伯兄一跋，謂戊辰立秋後二日，得見明吳訥本之《稼軒詞》丁集云。紙上朱筆乃計算丁集詞，以知為初秋手筆。³¹

作題記時，距當年 1 月 19 日梁啟超的病逝尚間隔不久，且清代學術部分的用紙亦與多封寫於 1918 年的信笺同源，故梁啟勳之說可以采信。何況，此份遺稿的存留，很可能是因其當日聽講後及時帶回。只是，該篇內容與通常所謂「講稿」有較大差別，僅限於勾勒出簡單的流派線索，多為人名、書名的排列。以此，下文即依據題跋所言，徑稱之為「備忘錄」。

追溯梁啟超的清學研究歷程，實則肇端於 1904 年流亡日本時，續寫《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第八章〈近世之學術〉（其他各章撰寫於 1902 年）。此篇和 1920 年完成的《清代學術概論》，以及 1923-1924 年在清華學校講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課程時編寫的同名講義，一向被視為完整體現了梁氏清學論述的成果。分析與闡發三部著述、尤其是〈近世之學術〉與其他二書之間的歧出，也成為考察梁啟超前後期學術思想轉化的重要途徑。而〈前清一代學術備忘錄〉的出現，又在前後期的研究中建立了過渡性關聯，故可認作梁啟超在此學術領域中為重新出發所作的預備。准此，以下的討論也將其置於這一學思脈絡中，而不囿於與《清代學術概論》的單一對比。當然，受資料本身的限制，與梁氏其他著述的比較只好更多從結構方面展開。

1904 年的〈近世之學術〉一章，將「起明亡以迄今日」的學術思想區劃為「永曆康熙間」、「乾嘉間」與「最近世」三期。《清代學術概論》雖設三十三小節，總體上卻只分為四段，即啟蒙期、全盛期、蛻分期與衰落期。而〈前清一代學術備忘錄〉的大綱次第為：清代學術開創之祖、清代理學（下分程朱派、陸王派、新派[實學派]、別派[禪悅派]、佛學）、清代經學（及經學別派）、清代史學（及地理學、天算學、目錄及校勘學、金石學）、清代文學家（下分古文家、駢體文家、詩家、詞家）、新思想之開發者、廣東先輩、清代

³¹ 梁啟超：〈清代學術講稿〉（梁啟勳跋），同註 5，下冊，頁 605-620。

編纂諸書、清代最有價值之著述；又有餘外兩紙，一為補清代史學之述，一為晚明至清初重要學者名錄。這樣的類目編排顯然有利於短期內每日一講的安排。倘若與《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相對照，不難發現，在編列形式上，二者更為接近。後書自第五講以下的章目為：陽明學派之餘波及其修正、清代經學之建設、兩畸儒、清初史學之建設、程朱學派及其依附者、實踐實用主義、科學之曙光、清初學海波瀾餘錄、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一至四）。這樣的兩兩趨同，應該也體現了著作與講學之間的差別。

而無論是哪一種著述，梁啟超對清初學術的梳理都相當用力，《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有關「各時期重要人物和他的學術成績」³²的分章論說，甚至只到清初為止。因此，梁氏對於「清代學術開創之祖」的認定便值得特別關注。〈近世之學術〉於第一期所論「大師十有六人」：

於其間承舊學派之終者，得六人，曰孫夏峰、李二曲、陸桴亭、二張蒿庵、楊園、呂晚村；為新舊學派之過渡者，得五人，曰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顏習齋、劉繼莊；開新學派之始者，得五人，曰閻百詩、二萬充宗、李野、胡東樵、王寅旭；自餘或傳薪，或別起，皆附庸也，不足以當大師。

而梁氏最推崇者實在過渡之五人，後來所謂「開新學派之始者」，不過是「各明其一體」，³³更專精而已。這一名單到 1918 年，已精簡為「顧亭林炎武」、「黃梨洲宗義」、「王船山夫之」³⁴三人。《清代學術概論》雖然在三大家之外，又添上了顏元，而稱「吾於清初大師，最尊顧、黃、王、顏」；實際論述中，顏元仍是單獨處理，因其「道太刻苦」，「傳者卒稀，非久遂中絕」。³⁵《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最後編定的文本中又有擴展，按照學派，分別論列了總共十六位代表人物（「附」者不計）；不過，在最初的刊本裏，梁啟超已指認，「這時期的代表人物，最偉大者」是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朱舜水。只是與上述顏元的情況相似，梁稱朱為「日本學術界最大的恩人，在本國卻沒有什麼影響」。³⁶可見，儘管各本多有出入，而顧、黃、王作為中堅的地位始終不變。

並且，顧、黃、王三家開創者的地位，也體現在清學各個面向。這在只存名目的〈備忘錄〉中尤其突出。顧炎武與黃宗義分別位於「清代經學」與「清代史學」第一名的位次，

³² 梁啟超著，夏曉虹、陸胤校：《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新校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頁 37。

³³ 中國之新民：《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新民叢報》第 53 號（1904），頁 46；第 54 號（1904），頁 60。

³⁴ 梁啟超：〈清代學術講稿〉，同註 31，頁 606。

³⁵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頁 29、39。

³⁶ 同註 32，頁 21。其中第二、三、四講先以〈清代政治之影響於學術者〉為題，刊於 1923 年 12 月 1 日《晨報五周年紀念增刊》。

恰與《清代學術概論》「大抵清代經學之祖推炎武，其史學之祖當推宗義」的論斷一致。王夫之列為「經學別派」第一人，由 1920 年代的兩部著述，梁啟超論定其「欲挽明以返諸宋」，「尤能為深沉之思以擇釋名理」，是「要建設自己一家的哲學」，³⁷《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更將其與朱舜水一同命名為「兩崎儒」，即可知〈備忘錄〉此處之用心。

此外，顧炎武與王夫之也緊隨黃宗義之後，列於「清代史學」諸大家。其中，黃又在補「天算學」的名單中出現（位列第一），「清代最有價值之著述」中亦開列了其所著《明儒學案》與《金石例》。顧炎武則既著錄於「地理學」項下（位列第二），並將其《天下郡國利病書》納入「清代編纂諸書」，也成為「金石學」的開山人（位列第一），所著《日知錄》亦居「清代最有價值之著述」首席，則顧氏於清代史學影響之大由此一目了然。

而參觀梁啟超前後著述，即可明瞭〈備忘錄〉如此排列的緣由。梁對黃宗義的《明儒學案》一直甚為推崇，1902 年撰寫《新史學》時，從中國舊史中僅僅擇出六部帶有創造性的著作，《明儒學案》即名列其中。〈近世之學術〉盛讚黃「開拓萬古、推倒一時」，《明儒學案》也被首先提出，其意義不只「為一代儒林藪」與「講學之圭臬」，「抑亦史界一新紀元也，學之有史，自梨洲始也」。同時得到大力肯定的尚有《明夷待訪錄》，謂為「幾奪盧梭《民約》之席」，「釐然有法治之精神」，這在其時正熱衷輸入西學的梁啟超那裏，已是極高的評價。梁亦認定黃宗義「《句股圖說》、《開方命算》、《測圓要義》諸作，啟近世研究算學之端緒」。³⁸儘管在梁啟超書寫的〈備忘錄〉正文中，《明夷待訪錄》並未現身，然而被梁啟勳指為當日兒曹塗鴉的文字中，卻正有此書名，可旁證梁講學之際亦有言及。而上引諸論也為《清代學術概論》與《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所沿襲。「三大家」中，梁啟超對顧炎武顯然更多好感，1904 年即已斷定「言清學之祖，必推亭林」，因「亭林之《日知錄》，為有清一代學術所從出」，「其《天下郡國利病書》及《肇域志》，雖未成之本，然後世言人文地理者祖焉」，「聲音訓詁，為百余年間漢學之中堅，其星宿海則自《音學五書》也；金石學自乾嘉以來，蔚為大國，則亦《金石文字說[記]》為其先河也」。此即《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所陳說的顧氏「開學風」、「開治學方法」以及「開學術門類」之功。³⁹至於王夫之的躋身「清代史學」，則純以《讀通鑒論》與《宋論》二書。從〈近世之學術〉稱讚其「史識卓絕千古」，到《清代學術概論》謂之「皆有特識，而後之史學家不循斯軌」，一直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議論「這兩部自然不是船山第一等著作，但在史評一類書裏頭，可以說是最有價值的」，⁴⁰評價明顯逐漸低落，這應該也是在〈備忘錄〉與史學相

³⁷ 同註 35，頁 29-30、33、34；同註 32，頁 21。

³⁸ 中國之新民：《新史學》第一章〈中國之舊史學〉、《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新民叢報》第 1 號（1902），頁 47；第 53 號，頁 53。

³⁹ 中國之新民：《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新民叢報》第 53 號，頁 52-53；同註 32，頁 82。

⁴⁰ 同註 39，頁 54；同註 35，頁 86；同註 32，頁 102。

關的其他類目中，不再出現王夫之名字的原因。

另外值得一說的還有黃宗羲之列入「清代理學」中的「陸王派」，名次在第五位，即倒數第二人。這與《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既指稱「其所承學統最明」、「親受業蕺山（按：指劉宗周），以接姚江（按：指王陽明）之傳」，卻又斷言「梨洲學自梨洲學，非陽明亦非蕺山也」，持論頗有出入。驗諸《清代學術概論》以黃為「『王學』之反動」，同時又承認其「始終不非王學，但是正其末流之空疏而已」，以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推尊其為「清代王學唯一之大師」，「是王學的繼承者、修正者」，⁴¹〈備忘錄〉所給予的位置，正顯示出梁啟超在黃宗羲學派歸屬問題上的遊移，以及最終歸向王學的趨勢。

而前後評價分歧最大的人物或為毛奇齡。〈近世之學術〉以之為「學界蝨賊」、「真小人」，評說中無一句好言，甚至斥為：「跡其所抨擊，純然市井無賴叫囂者之所為，稍有學養者，未必為動。」到了《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的口氣卻大為改變：「若論清學界最初之革命者，尚有毛奇齡其人。」「平心論之，毛氏在啟蒙期，不失為一衝鋒陷陣之猛將，但於『學者的道德』缺焉。後儒不宗之宜耳。」⁴²而這一轉變的苗頭，也先在〈備忘錄〉呈現出來。毛氏於「清代經學」列表中的位次，為緊隨顧炎武之後的第二人，尚在閻若璩（字百詩）、胡渭（字拙明，號東樵）之前，已足見其重要性的提升。

作為清學各流派的總結，梁啟超在〈備忘錄〉中尚專門設置了「新思想之開發者」一目，所列諸人如下：

黃梨洲 王船山 顧亭林 戴東原 羅臺山 龔定庵 康南海 譚壯飛⁴³

其中羅有高（臺山），梁以之為「清代理學」之「別派（禪悅派）」代表，當為一時之見，後未見續論。其他諸家，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多半都享有專節分疏的待遇（黃、王合為一節，龔有半節篇幅，康有為甚至獨佔兩節），確成為其清學史上的關鍵人物。

至於瀏覽不以學者、而以著作編列的「清代編纂諸書」與「清代最有價值之著述」，則不難聯想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後半部的〈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只是，在後書中，這份成績單不只多出了評述，更有了細緻的分類，即經學、小學及音韻學、校注先秦子書及其他古籍、辨偽書、輯佚書、史學、方志學、地理學、譜牒學、曆算學及其他科學、樂曲學。⁴⁴回頭看〈備忘錄〉，「清代編纂諸書」僅列舉了「官纂」二十一種、「私

⁴¹ 同註 39，頁 51；同註 35，頁 35；同註 32，頁 57、21。

⁴² 中國之新民：《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新民叢報》第 54 號，頁 65、57；同註 35，頁 28。

⁴³ 同註 34，頁 611。

⁴⁴ 原先計畫寫作的類別更多，參見筆者〈作為講義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馬來亞大學中文系編：《漢學研究學刊》第 2 卷（2011）；又同註 32，頁 443-444。

纂」八種，無疑過於簡陋。即使在「清代最有價值之著述」裏，書目達到了六十二種，仍嫌不足，排列也缺少嚴格的章法。當然，這是以後之視今的結果。如若放在當年家庭講學的環境以及匆促的草稿狀態中，這份書單的簡要自有合理性。而其最重要的意義，尤在對後來著述的啟示。

除了可與梁啟超其他清學著作相互參照的主體部分外，〈備忘錄〉也有特出之處。一是地方關懷。以梁之粵人身份，故特別為子女開講「廣東先輩」，其人計有：

黎二樵簡 林月亭伯桐 曾勉士釗 張南山維屏 吳荷屋榮光 朱子襄次琦 陳蘭甫澧 馮魚山敏昌 梁章冉廷桢 譚玉生瑩 李若農文田 葉南雪衍蘭 潘孺初存 陳慶笙樹鏞 康長素有為 簡竹居朝亮⁴⁵

這自然屬於家庭教育中不可缺少的對於家鄉文化傳統的認知。

另一特點是文學觀照。這既是梁啟超個人興趣的投射，也是對子女進行辭章之學訓練的延續。鑒於以「清代文學家」為名的內容從未包括在梁之清學史著作中，故不妨全部逐錄於下（只保留本名，略去字、號與籍貫）：

古文家

侯方域 魏禧 方苞 劉大櫟 姚鼐 惲敬 張惠言 李兆洛 包世臣 龔自珍 曾國藩

駢體文家

胡天游 汪中 孔廣森 孫星衍 洪亮吉

詩家

錢謙益 吳偉業 王士禎 趙執信 嶺南三家（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 袁蔣趙（袁枚、蔣士銓、趙翼） 王曇 龔自珍 黎簡 鄭珍 黃遵憲 康有為

詞家

陳維崧 顧貞觀 納蘭性德 郭麐 張惠言 鄭文焯 王鵬運 朱祖謀⁴⁶

這一篇名錄，其實也可以視為梁啟超編寫清代文學史（或清代文學流別）的關目，無疑對於現在的研究者最具價值。由此亦可解釋，在同一冊頁中，為何另有四紙魏晉至元明清文學的備忘錄。顯然，在梁啟超看來，類似今日文學史的敘述，作為不可缺少的國學常

⁴⁵ 同註 34，頁 612。

⁴⁶ 同註 34，頁 610-611。

識，理應納入「學術流別」的講授中，使子女及早知曉與受益。

而將梁啟超 1918 年關於「前清一代學術」的家庭講學備忘錄遺稿，回置到其清學研究的整個歷程中，對勘前後文本的異同，不但足以使這份簡單的名錄豐富起來，進而亦可發現，梁在講演時，既參考了 1904 年《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相關論述，又開始對部分觀點進行修正。而這些新的思考與闡發，在《清代學術概論》以及其後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得到了陸續體現。尤其是《清代學術概論》初題「前清一代中國思想界之蛻變」，⁴⁷從命名上即已顯示出與 1918 年講學的密切關聯。因此，總括這份〈前清一代學術備忘錄〉的意義，如果說，它在編纂體例上為《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提前作了預演，那麼，長達六萬言的《清代學術概論》之所以能夠在十五日內撰成，也正有賴於它的先期溫習與研討。

四、飲冰室三：講論《孟子》的試演

先秦諸子亦為梁啟超治學的一大重點。與流亡日本時期集注於墨子不同，梁氏後期的研究方面更廣。而其發端，也可追溯到 1918 年的家庭講學。並且，遠比「前清一代學術」目下只能看到簡目幸運得多，梁啟超書寫的《孟子》講義畢竟保留下來了。

1919 年 2 月，上海的《時事新報》曾連載梁氏〈讀《孟子》記（修養論之部）〉，開篇的「著者識」自道緣起：

客歲暑中為兒曹講《孟子》，略區為三部：一曰哲理論，二曰修養論，三曰政治論。今將修養論之部，刊登報中，聊為青年學古淑身之一助。全書未定稿，不敢以問世也。⁴⁸

據此我們可以知道，1918 年 8 月梁啟超為子女講《孟子》，講義稿題名為〈讀《孟子》記〉，並分為哲理論、修養論與政治論三部分。其規模為一本著作，當時並未定稿。

不過，1983 年，《學術研究》第 5 期刊發了李建撰寫的〈關於梁啟超論孟子遺稿〉，披露了由其父親、梁啟超的學生及秘書何澄一傳給他的一份梁氏論《孟子》手稿：

〈遺稿〉為毛筆手書，直行，古紙本，共一百三十二頁，約二萬字。前面為〈孟

⁴⁷ 梁啟超：〈前清一代中國思想界之蛻變〉，《改造》第 3 卷第 3-5 號（1920-1921）。

⁴⁸ 梁啟超：〈讀《孟子》記（修養論之部）〉，《時事新報》第 3 張第 3 版，1919 年 2 月 4 日。全文連載時間為 1919 年 2 月 4-8、10-13 日。

子略傳》，十頁，約一千五百字。主體部分為〈孟子之教育主義〉，一百二十二頁，約一萬八千多字。全書未單獨標出章、節、目，在論述「性善」之後，又論述了孟子發揮本能之教的次序；孟子談入道之途；還論述了孟子思想的其他若干方面。

李建的推測是：「從主題內容與文教事業聯繫起來看，似應是他歐遊回國後的著作。」⁴⁹同期雜誌也刊出了應該是由李建整理的〈梁啟超論孟子遺稿〉。而這份梁氏手稿，李建當時曾複印一份送給湯志鈞先生。2007年，湯先生發表了〈梁啟超論《孟子》〉一文，除關於手稿的〈孟子略傳〉部分「凡8葉」與李說不同外，又補充了「每葉8行，金糕紙，色略黃」的細節。湯文亦揭示出《時事新報》所刊〈讀《孟子》記（修養論之部）〉與手稿的關係，即「《時事新報》只登載〈論《孟子》〉的一部分，排校又有誤植，它又發表在『手稿』修改之前」。具體說來，《時事新報》發表者，乃是自原稿39頁以下部分，尚有約6600字未曾登載；手稿較之發表稿，又有添加及修改。⁵⁰如此，這篇由梁啟超送給何澄一的文稿，也由李建從知情人處瞭解到的「系梁平時讀書筆記性質」，⁵¹而與1918年梁氏的家庭講學掛上鉤。

既然這份手稿與「為兒曹講《孟子》」有關，梁啟超又曾在信中特意說明，此回「非隨文解釋，講義略同學案」，因此，講《孟子》之不同於「學術流別」的只記簡目，而需要撰寫更詳細的講稿，也可想而知。至於後來的添改，既可能與家庭講學中止後，梁啟超的繼續研讀有關，如1918年9月30日梁氏寫信給其弟啟勳，言及「每日常課」仍有「十一時讀《孟子》（加眉批）」一項；⁵²更大的可能性則是因其1920年歸國後，仍在不斷回到這個題目上來所留下的痕跡（說見下）。這也可以解釋梁啟超1918年12月28日自上海放洋後一月餘方才刊出的文章，在手稿上仍續有修訂的緣故。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湯志鈞先生描述：「『手稿』在『孟子發揮本能之教，其次序亦有可尋者，第一立志，第二操存，第三長養，第四擴充也。』上空一行，下另起葉，即《時事新報》所載的『孟子既昌言性善』一段開始。」⁵³則兩段文字似乎並非一氣呵成。而前後所論也不盡相合。最明顯的是上述「發揮本能之教」的次序有四，而《時事新報》刊出稿卻依照「孟子提絜[挈]三義焉：曰立志，曰存養，曰擴充」⁵⁴展開，即已將「操存」與「長養」合併為「存養」。這應該是在隨寫隨講的過程中，梁啟超的想法有所改變。

⁴⁹ 李建：〈關於梁啟超論孟子遺稿〉，《學術研究》第5期（1983），頁99。

⁵⁰ 湯志鈞：〈梁啟超論《孟子》〉，《史林》第3期（2007），頁178-180。

⁵¹ 同註49。

⁵² 梁啟超：〈致梁啟勳書〉（1918年9月30日），同註5，頁89。

⁵³ 同註50，頁179註③。

⁵⁴ 同註48。

就手稿的外在形式而言，〈孟子略傳〉相對獨立，作為對著作者生平事蹟的概要介紹，比較容易瞭解。接下來的〈孟子之教育主義〉，從標題規格看，應與之並列。只是，再下一級的標題，卻只剩下直接置於其後的〈性善論〉一目。此外，便是如前所述的將「孟子發揮本能之教」數語前後隔斷的處理。

此稿的講述次序，先分析孟子的「性善論」，揭出其「特標性善為進德關鍵」，並將「今古論性」分為五家，肯定孟說「所以勸向上，其義精」，但也認為孟子之論亦有不圓滿及界說含混處。最終歸納為：「孟荀言性，皆所以樹教育主義之根柢。孟言性善，故其教法在發揮本能；荀言性惡，故其教法在變化氣質。二者各有所長，而孟子尤能先立乎其大矣。」以下即就「發揮本能之教」展開論述。先概說「性」與「習」之關係，認為「習」由環境養成，故「修養」成為關鍵：「性雖善而可以習於不善，如何而始能免於不善？曰惟修養。性雖惡而可以習於善，如何而能進於善？曰惟修養。故孟荀言性雖相反，而其歸本於修養一也。」孟子所論修養方法，由梁啟超區劃為「立志」、「存養」、「擴充」三義，下文便逐一闡發。隨後再討論「因個人氣質不齊，故入道之途亦異」，而提出孟子最獎勵的「狂」、「狷」兩種進路。直至「孟子教人修養之途徑，大略具是矣」的總結之後，梁氏仍有餘論，涉及「孟子極言教育為人生之一種責任」，《孟子》「言智育教育」，其論「生於憂患」對於成就個人與國家的意義，孟子「言命」之損、益兩面觀，最後則以「孟子最尊改過」為「善誘學者之一端也」結束。⁵⁵若就最後散論部分的處理來看，李建謂之「讀書筆記」，倒也近似，但這應該是尚未定稿造成的。

而由於內置標題的不完備和空行、轉頁之類分割的存在，確實令人不免產生〈讀《孟子》記〉手稿除《時事新報》已然注明的「修養論」外，是否還包含了其他部分的疑問。或者更擴大一點，而追問梁啟超當年講授孟子的哲理論、修養論與政治論究竟包括了哪些內容。顯然，就原稿本身，問題很難求解，故需要再引入其他文本作為參照。

1920年3月，梁啟超歐遊歸來；同年12月2日起，即受邀在清華學校做「國學小史」的課外演講。此講座延續了五十餘次，⁵⁶講稿中的若干章節經過整理，後分別以〈諸子考證與其勃興之原因〉、〈老子哲學〉與《墨子學案》的題目發表。其他當時未定稿或完稿部分，如〈孔子〉、〈三聖以後學派概觀〉，則在編輯《飲冰室合集·專集》時收入。⁵⁷而〈三聖以後學派概觀〉之第三節〈孔子所衍生之學派〉，於第一小節〈略論〉末後已預告，下

⁵⁵ 梁啟超：〈梁啟超論孟子遺稿〉，《學術研究》第5期（1983），頁79-98。下文凡引此稿，頁碼直接標注在文內。凡排印錯誤已經改，標點間有調整。

⁵⁶ 參見梁啟超：〈自敘〉，《墨子學案》（上海：商務印書館，1921），自敘頁1。

⁵⁷ 參見筆者〈1920年代梁啟超與胡適的學術因緣——以新發現的梁啟超書劄為中心〉，《中華文史論叢》第3期（2010）。梁啟超手稿本中〈三聖以後學派概觀〉收入《飲冰室合集》時，改題為《老孔墨以後學派概觀》。

文將「獨論孟荀」。⁵⁸不過，隨後的第二小節〈孟子〉似未完篇，〈荀子〉更不見隻字，想來是因「冬假輟講」而中止。⁵⁹

「國學小史」的課名，讓人聯想起梁啟超出國前的家庭講學，梁亦稱之為「國學流別」。而比對前後兩次有關《孟子》的論述，其中確實多有關聯。當然，喜新善變的梁啟超，即使重複講授同一內容，也必定要進行調整。最明顯的是「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在南開學校與東南大學的兩次同題授課，後出的記錄稿與梁氏早先自己寫作的講稿，在結構與選例上已有若干變化，但基本思路仍在延續。⁶⁰《國學小史》論《孟子》亦然。與 1918 年手稿的區分為「哲理」、「修養」與「政治」三論不同，此次梁啟超已將孟子的學說簡化為「內業派」與「經世派」兩部分。梁氏認為，《孟子》「全書精神」可以〈滕文公〉篇中的「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兩語貫之：「『道性善』，孟子內業學說之根據也；『稱堯舜』，孟子經世學說之根據也。」⁶¹儘管此說後半與〈讀《孟子》記〉理解不同，手稿將「稱堯舜」與孟子所說「人皆可以為堯舜」等同，盡歸入「所以申性善之義」（頁 80）；不過，這一差異並不足以影響兩篇論述更多的同質性。

所謂孟子的「內業學說」，在梁啟超說來，仍以「為自己修養起見，為教育之理論及應用起見」⁶²作主軸。其核心論點，在〈讀《孟子》記〉中均已先行闡述。梁氏概括孟子言修養及教育的精髓，在於從「性善論」出發的「發揮本能之教」（頁 83）。此說乃是與主張「性惡」的荀子學說相比較而得出的結論。其說：

荀子之教尊他力，故言假物，（〈勸學篇〉云：「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重得師。（〈修身篇〉云：「莫要得師。」又云：「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又云：「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舍亂妄無為也。」）此與其性惡之旨相一貫。蓋性既惡，則非藉他力不能以矯正也。孟子言性善，故尊自力，其言曰「萬物皆備於我」（〈盡心〉下[上]）；曰「反求諸己而已矣」（〈公孫醜〉上）；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離婁〉上）。孟子常教人學聖人，然又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告子〉上），是自師吾心，即所

⁵⁸ 梁啟超：《老孔墨以後學派概觀》，《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頁 28。

⁵⁹ 梁啟超：〈梁啟超信十三通〉之一，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合肥：黃山書社，1994），第 33 冊，頁 9。

⁶⁰ 參見梁啟超《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初刊 1922 年 5 月《改造》第 4 卷第 9 號，未完，後全文收入《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七十；衛士生、束世澂筆記：《（梁任公先生講）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上海：中華書局，1925）。

⁶¹ 同註 58。

⁶² 同註 58，頁 29。

以師聖人也。故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告子〉下）（頁 85）

此言稍加改寫後，也進入了《國學小史》。而下引孟子「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源」（〈離婁〉下），然後發揮：「自得者，純恃自力之謂。聖賢師友，能示我以為學之法，不能代我為學。能引我志於道，不能代我入道。」已與〈讀《孟子》記〉（頁 85）差不多完全相同。此外，如引孟子「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告子〉上）之後的大段解說，也全部錄自〈讀《孟子》記〉（頁 88-89）。⁶³於此可見兩本之間的承襲關係。

只是，依照梁啟超性格，每次重講時必有更改。其間自然有因研讀深入而糾正前說之處，如上述「言必稱堯舜」的解說變異。加以《國學小史》中之〈孟子〉一節，並非採用家庭講學之際的「學案」體，故線索力求明快，引文更加精簡。討論性善論之理論基礎及其說能否成立之後，梁啟超關注的依然是：「惡環境既足以陷溺人，則以他力改善環境或以自力抵抗環境，皆足以恢復其本來之善。」前者即「社會教育之所宜有事」，後者即「個性教育之所宜有事」。不同於荀子的「尊他力」，孟子更重視「自力」。依此展開，梁啟超即將「自力修養之方法」歸納為「消極的抵抗」與「積極的發展」二種。其「消極的抵抗」所述不「為物役」等言，大多出自〈讀《孟子》記〉的「存養」說；而「積極的發展」強調「各人苟將其個性充量發展，皆可以完成圓滿的人格」，⁶⁴闡論又與〈讀《孟子》記〉的「擴充」說相近。可見，後出的文本雖有變化，而大致輪廓猶在。

另外，《國學小史》論《孟子》之「經世學說」，正文中直接稱之為「孟子之政治論」。以前述「修養論」彼此相關情形推之，則此節文字亦應脫胎於 1918 年 8 月「為兒曹講《孟子》」時之「政治論」。梁啟超認為，孟子「祖述孔子大同之旨，其必稱堯舜者，借堯舜以寄其公天下之理想也」。故「論國家非君主私有」，「論法律之下萬人平等」，「皆孟子政治上重要之理想」。雖然肯定其說「為民權思想之先河」，但梁仍指出，「孟子僅言『保民』，言『牧民』，言『民之父母』，而未嘗言民自為治」，實為其缺點。在梁啟超看來，「孟子政治論最重要之部分，則其經濟制度也。」孟子以「整理土地制度」為「經濟政策第一要件」，其理想的土地制度，即體現「公有」與「平均分配」的井田制。孟子的經濟思想又為其道德學說之本原，故梁氏認定，「孟子心目中之半共產的社會，不徒以此謀物質上之給足，實以為人類精神保健之一良劑也」。⁶⁵

⁶³ 同註 58，頁 32-33。

⁶⁴ 同註 58，頁 31-34。

⁶⁵ 同註 58，頁 36-38。

應該說，《國學小史》關於孟子之「政治論」，因其說未完，又被「言必稱堯舜」引導、鎖定，故不免偏向孟子的政治理想，一些更重要的思想尚未及闡述。這在 1923 年秋季學期，梁啟超在清華學校講授「群書概要」（後改名為《要籍解題及其讀法》）時已有所彌補。限於體例，梁氏關於「《孟子》之內容及其價值」的言說十分簡略，所撮述之「政治談」要點為：「發揮民本主義，排斥國家的功利主義，提出經濟上種種理想的建設。」並言及孟子之「政治談」，因時代不同，其具體的制度自多不適用；然其根本精神固有永久價值」。⁶⁶顯然，此時「民本主義」、「非功利主義」已更得到梁啟超的認同。

更進一步，借助《要籍解題及其讀法》對《孟子》「哲理談」的提要鉤玄，1918 年〈讀《孟子》記〉中「哲理論」與「修養論」如何切分的問題亦可獲解：

窮究心性之體相，證成性善之旨。《告子》上下篇、《盡心》上篇，多屬此類。

67

因知手稿中〈孟子之教育主義〉題下的〈性善論〉部分，即為梁啟超所謂「哲理論之部」，當截止於空行前的「而孟子尤能先立乎其大矣」（頁 83）。以下便進入「修養論」。只是由於梁啟超編寫講稿時思路有調整，修養之方由四變三，才使得「孟子發揮本能之教，其次序亦有可尋者，第一立志，第二據[操]存，第三長養，第四擴充也」（頁 83）一段文字落了單。

檢視三個文本，不但可以大體還原梁啟超 1918 年 8 月在天津飲冰室家中為子女講《孟子》部分的主要內容，而且，從〈讀《孟子》記〉到《國學小史》，更可以清晰看出，此一由家庭講學引發的興致與編寫的講義，如何在日後面向眾多學子的大學課堂派上用場。也即是說，家庭猶如試演場，雖因年齡及學識差別，令梁啟超不免有「彼輩如何能解」、「頗有對牛彈琴」之歎，但其堅持不懈，每日用整個上午講學，仍然是期望早期的傳授能夠收效於將來。這也是在所有三次關於《孟子》的講學中，梁啟超特重「修養論」的原因：

要之《孟子》為修養最適當之書，於今日青年尤為相宜。學者宜摘取其中精要語熟誦，或鈔出常常閱覽，使其精神深入我之「下意識」中，則一生做人基礎可以穩固，而且日日向上，至老不衰矣。⁶⁸

因此，梁啟超率先發表〈讀《孟子》記〉修養論之部，目的也確如題記中所言，期望以之「為青年學古淑身之一助」。畢竟，1918 年，梁思順二十六歲，梁思成十八歲，正與

⁶⁶ 梁啟超：《群書概要》，《清華週刊》第 288 期之《書報介紹副鐫》第 5 期（1923），頁 14。

⁶⁷ 同前註。

⁶⁸ 同註 66，頁 15。

清華學校學生年齡相仿。

鉤稽 1909 至 1910 年以及 1918 年夏季梁啟超兩次為子女集中授課的概況，儘管前後的目標與內涵不同，大而言之，卻始終在其一貫強調的「國學」傳授範圍裏。而家庭講學本與現代學校中的專科教育不同，更接近今日所謂「通識教育」，故辭章之學、人格修養、學術源流以至文學史知識，都為梁啟超所注目。尤其時當 1918 年，梁啟超適處於由政治家向學者轉變的重要階段，家庭內的預演亦為其 1920 年歸國後再度輝煌的學術生涯集聚了相當能量。因此，無論是《清代學術概論》的迅速完稿，還是「國學小史」在清華的開講，背後都連接著兩年前的家庭講學。在此意義上，受益者不只為兒曹，梁啟超的家學確已沾丐學界。

2012 年 11 月 18 日於京西圓明園花園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

——：《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清華週刊》第281期之《書報介紹附刊》第3期（1923）。

——：《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年。

——：《墨子學案》，上海：商務印書館，1921年。

——：《群書概要》，《清華週刊》第288期之《書報介紹副鐫》第5期（1923）。

——：《國學小史》，手稿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飲冰室尺牘》，任心白手抄、張元濟手校抄本（上海圖書館藏）。

——：〈前清一代中國思想界之蛻變〉，《改造》第3卷第3-5號（1920-1921）。

——：〈讀《孟子》記（修養論之部）〉，《時事新報》第3版，1919年2月4-8、10-13日。

——：〈梁啟超論孟子遺稿〉，《學術研究》第5期（1983）。

梁啟超著，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梁啟超未刊書信手跡》，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梁啟超著，張品興編《梁啟超家書》，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年。

梁啟超著，夏曉虹、陸胤校：《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新校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

中國之新民（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新民叢報》第53、54號（1904）。

——：《新史學》，《新民叢報》第1號（1902）。

梁啟超、熊希齡等：〈周年追悼會啟事〉，《晨鐘報》，1918年7月12日。

滄江（梁啟超）：〈題藝衡館日記第一編〉，《國風報》第2年第11期（1911）。

中華書局編輯部、北京匡時國際拍賣有限公司編：《南長街54號梁氏檔案》，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梁令嫻編：《藝衡館詞選》（1908）。

梁令嫻：〈敬述吾家舊德為婦女雜誌祝〉，《婦女雜誌》第1卷第1號（1915）。

二、近人論著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李建：〈關於梁啟超論孟子遺稿〉，《學術研究》第5期（1983）。

許俊雅編注：《梁啟超與林獻堂往來書笥》，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7年。

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

須藤瑞代著，須藤瑞代、姚毅譯：《中國「女權」概念的變遷——清末民初的人權和社會性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吳荔明：《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民國春秋》第1-2期（199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臺北：立緒文化公司（200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張元濟：《張元濟日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

張朋園：〈梁啟超的家庭生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歷史人物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

夏曉虹：〈作為講義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馬來亞大學中文系編：《漢學研究學刊》第2卷（2011）。

——：〈1920年代梁啟超與胡適的學術因緣——以新發現的梁啟超書笥為中心〉，《中華文史論叢》第3期（2010）。

湯志鈞：〈梁啟超論《孟子》〉，《史林》第3期（2007）。

A Research on Liang Qichao's Family Lecture Activities

Xia Xiao-ho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manuscripts of Liang Qichao, this essay focuses on a reconstruction of Liang's two lectures in his family circle. Beside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ontents of the lectures, I will also discuss the deep significant of the lectures by embedding them into the context of Liang's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The first lecture took place in Japan between 1909 and 1910, where Liang taught his daughter Liang Sishun the Chinese writing and rhetoric. In order to resist the powerful influence of the Japanese language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Liang intended to make his daughter familiar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intellectual resources. The second lecture took place in summer 1918, whose content consists in two parts: one of them was focusing on "academic schools" and the other was dealing with Mencius. The manuscripts of them were both saved. In my opinion, the former titled Notes on the Learning of Qing Dynasty(〈前清一代學術備忘錄〉) could be regarded as a preparation of Liang's two famous works written in 1920s, i.e. Introduction to the Learning of Qing Dynasty (《清代學術概論》)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earning in Recent Three Hundred Years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while the latter titled Review on Mencius (〈讀《孟子》記〉) has also contributed a lot to Liang's public lecture on "A Brief History of National Learning" which took subsequently at Tsinghua School in 1920 and 1921. The reach of the influence of these lectures was thus far beyond Liang's family circle; even the intellectual public has benefited a lot from them later.

Keywords: Liang Qichao, family lecture, Chinese writing and rhetoric, The Learning of Qing Dynasty, *Menciu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